

结构性转化视域下高校女教师单身现象的伦理审视

赵欣彤

1 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700;

2 广州商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700;

摘要: 我国结婚率呈下降趋势, 高校女教师作为高学历群体, 其单身现象受到社会的关注。基于社会结构转型视角, 从家庭结构、女性角色、生活圈的转变深入剖析高校女教师单身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 并展开伦理审视, 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全新视角, 助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 高校女教师; 单身现象; 社会结构转型; 伦理冲突

DOI: 10.69979/3029-2735.25.10.071

随着民政部网站《2024 年 4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的公布, 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共 610.6 对, 相较于 2023 年全国结婚登记的 768.2 万对, 减少 157.6 万对, 降幅达到 20.5%, 经统计, 为 2007 年以来最低。^[1]伴随结婚率降低, 社会上引发了“她”经济的崛起和对单身群体的关注,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教师群体, 尤其是高校女教师单身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与争议。在当代高校女教师群体中, 单身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 大致可分为大龄未婚、适龄不婚、离异单身三种类型。此现象不仅是个体生活选择的结果, 更是诸多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因此, 本研究从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视角来探讨高校女教师单身现象成因, 并进行伦理审视。

1 家庭结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在家庭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当下, 社会各层面都经历着变革, 高校教师群体的婚恋状况成为很多领域的研究议题。其中, 有不少形象气质良好, 学识水平较为优异的高校女教师处于单身状态, 这一现象尤为引人注目。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单身状态间这一看似矛盾的表现背后隐匿着复杂的实质。其中, 传统家庭角色与当代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 成为高校女教师单身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伦常受到了当代社会结构的挑战。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以“三纲”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纲常, 伴随着与之相应的伦理规范约束, “三纲”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学者王歌雅指出, 婚姻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要受三纲的规范。为此, 三纲也是中国传统婚姻伦理的

基本原则。^[2]父为子纲是三纲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宗旨是为维护父权家长制下的孝道, 即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在家长制的统治下, 子女无法自由选择配偶, 婚姻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尤其是女性没有婚姻的自主权, 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 是关乎到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大事, 结婚便是传统伦理观念中履行孝道的具体实践方式, 女性角色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 在婚姻中, 女性所承担的治家职责, 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维系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 青年关于“婚姻”和“孝道”之间的关系逐渐产生了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理解。结婚与否, 与谁结婚和孝道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时任何组织或他人所都不能对此操控。现代婚姻伦理强调婚姻自由, 选择单身还是婚姻, 选择谁作为配偶, 男女双方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 不受他人强迫或干涉。当前处于婚恋自由的时代,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早已失效, 但“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依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对于部分思想相对传统的中老年群体, 婚姻依旧被视为主要的生活目标, 人生的必经之路。达到适婚年龄或超出适婚年龄但未步入恋爱或婚姻的孩子, 父母则通过语言或有目的的行动, 对子女施加心理压力, 督促单身青年结束单身生活。高校女教师长期的教育经历容易产生地域的流动性, 本科、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 以及工作地点的变化等使她们和原生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 脱离了原有社会关系网络, 有助于该群体摆脱传统地域婚恋文化的束缚以及家人的干涉, 婚姻的自主权逐步把握在自己手中。正如费孝通“差序格局”中指出, 人际格局就像一个水面上泛开的涟漪, 由自己延伸而去, 一圈一圈,

距离越远圈纹越浅,关系也就越疏远。^[3]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揭示了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态延展性,高校女教师因地域流动脱离原生家庭,其社交网络呈现“涟漪扩散”特征,传统婚恋干预随之弱化。

2 女性角色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分工模式有较为清晰的性别分工界限,即“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成为家庭主妇。“所谓主妇,就是非佣人,但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的人(或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管理佣人做家务),还可以说是做家务或者指挥佣人做家务的女性、家里的女主人、户主的妻子。”^[4]在传统家庭中,女性不与社会劳动,经济上依附与丈夫,主要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从事家务、生育子女、赡养老人等活动。

随着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传统家庭分工发生变化,女性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然而,女性从家庭走入社会,其主妇身份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大部分女性不仅是生育者,家务的操作者,同时也是“被雇佣者”,承受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重压力。《妇女蓝皮书: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分析》指出,夫妻共同参与家庭决策的情况明显,但在履行其他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家庭教育上还存在女性为主的现象。可见,家庭劳动依然具有性别属性,男性由于传统的社会观念和长期的劳动习惯很难同女性一样从事家庭劳动,家庭劳动也并没有因女性从事社会劳动而发生改变,女性依然是家庭劳动的主力军。

这种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延续以及现代社会的新变化,对高校女教师的婚恋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劳动分担期望与现实的落差。高校女教师受过高等教育并作为职业女性,具有支撑自己物质生活的能力,并对事业提升和家庭责任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希望对方能够分担家务、工作、情感和责任的重担。现代家庭伦理指出,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双方应当把家务劳动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本分,积极主动参与,而不是由一方包揽,另一方袖手旁观。这是一种内在的、理智的、持久的家务劳动道德,是处理一切家务劳动矛盾的总原则。高校女教师在社会中具有和男性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家庭领域内注重家庭地位的平等和承担家务劳动的平等。但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男性参与家庭劳动的现状并不乐观,同时媒体传播一定程度放

大了婚姻潜在的风险以及离婚率逐渐上升,使该群体意识到结婚可能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因此倾向于单身生活。

职业目标追求导致无暇顾及情感。高校女教师有较高的学历和职业目标,在读书阶段努力学习,勤奋好学,进入工作岗位后依然保持着进取心,积极向上,对自己有高要求高标准。她们为在事业中寻得更高层次,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则。在教学上,更新教学手段,制作多媒体课件,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在科研上,提高科研能力,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科研是高校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在职称评审上,提高科研积极性,职称是高校衡量教师身份的一项重要标志,高职称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工作收入的增加,^[5]因此,高校教师无法忽视对职称的追求。“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系统为了自身的生存不断地压缩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在个体层面通过时间的控制,规训个体进行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以便成为合格的系统运行中的成员。”^[6]充足的自由时间是恋爱的必要条件,但职业发展占用了该群体的时间资源,时间成本迫使其无暇顾及情感生活。

事业和家庭平衡的艰难抉择。高校女教师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促使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婚姻的判断越来越不拘于传统,即婚姻祛魅。“所谓‘祛魅’是指对一直追捧的文化、知识等神秘性、神圣性、魅惑性消解。”

^[3]在考虑婚姻时,会展现出理性的一面,不仅关注婚姻中需承担的责任,还要考虑婚姻生活可获得的收益。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至今仍有影响。在中国传统家庭观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一直被赋予“相夫教子”的角色。高校女教师从事教学和学术的工作,无论知识传播还是知识创造,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在教学上,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掌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才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呈现精彩课堂;在学术上,需纵观社会,敏锐地捕捉问题,创新性的提出解决方案。这都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靠个人的不断努力才能够完成。意识到无法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一旦结婚又陷入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影响自我实现和经济事业发展,该群体便会推迟婚育时间,继续保持单身状态。

3 生活圈由固定到流动的转变

在传统婚姻缔结模式中,由于社交范围相对狭小,

配偶的选择往往遵循邻近性原则。配偶双方通常来自同一地区、学校,或同一工作单位,高度重合的地缘与业缘关系,使双方拥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风俗习惯。在彼此相对熟悉的人际关系中,信任感得以快速建立,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降低,为婚姻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高校女教师的长期教育经历以及职业发展容易产生地域流动性。从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再到最终工作岗位的确定,需要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异地工作成为普遍状态。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使该群体缺乏稳定且熟悉的人际网络,不易寻得合适的婚恋对象。因此,为了寻找合适伴侣,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她们应主动参与正当的合乎礼仪的社交场合,有意识地与合适的人打交道,努力搭建并开拓新的人际网络,不断增加择偶的范围和机遇。

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高校女教师通常重视自我感受和自我认可,精神上呈现出独立性的特点。在私人领域内,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她们享受独处的时光,做使自己身心愉悦的事,如读书、烹饪美食、健身、养宠购物等。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时常与同事尤其是同性别的高校女教师相约聚餐,一起听讲座、看画展等。她们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且丰富的业余生活。总体上看,该群体在社交方面呈现出被动的特点,通常在熟悉的社交范围内开展活动,很少主动拓展社交范围。“有着相似生活经验、教育背景、互动经历乃至生命规律等的人,更可能达成一种共识与自觉,形成一种圈子文化。”^[7]在高校环境中,女教师因相似的教育背景以及相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逐渐形成特有的圈内文化。当圈外同龄人进行婚恋活动时,该群体沉浸于自己所属的圈内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单身现象并不少见,使她们形成“身边人皆如此,自身亦无需着急”的心理,产生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错过了参与婚恋活动或寻找伴侣的时机。

高校女教师单身现象是家庭结构、女性角色、生活

圈等社会结构转变的综合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伦理关系和冲突。传统与现代伦理观念的碰撞,在家庭角色、性别分工、社交择偶等多个方面影响该群体的婚恋选择。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应充分尊重该群体的个体伦理选择,积极倡导平等、多元的伦理观念,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伦理环境,帮助该群体更好地平衡私人生活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关系,为解决其单身困境提供支持。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构建更为完备的社会支持体系,从伦理层面为该群体提供科学且有效的帮助,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4 年 4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EB/OL]. [2025-3-5]. <https://www.mca.gov.cn/mzsj/tjsj/2024/2024dssjdtjsj.htm>
- [2] 王歌雅. 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4-35.
- [3] 时广军. “过度教育”与“过度单身”——当代青年社会流动的代价[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04): 34-39.
- [4] [日] 落合惠美子, 郑杨译. 21 世纪的日本家庭: 何去何从[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52
- [5] 郭俊. 当前高校教师群体压力源与缓解对策[J]. 教育与职业, 2014, (33): 81-83.
- [6] 胡忠魁. 单身青年现象的形成——基于“日常交往”框架嵌入规训的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 (03): 67-72.
- [7] 张桂平, 廖建桥. 用“圈子文化”管理员工沉默行为[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9 (6): 29-31.

作者简介: 赵欣彤(1996.12-), 女, 汉族, 河北武安人,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 应用伦理学。